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 中印涉藏关系史 —

(1914~1950)



—以英帝国外交史
为中心

[英] 阿拉斯泰尔 · 兰姆 / 著

梁俊艳 / 译 张云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中印涉藏关系史

(1914~1950)

—— 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

[英] 阿拉斯泰尔·兰姆 / 著

梁俊艳 / 译 张云 /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以英帝国外交史为
中心 / (英)阿拉斯泰尔·兰姆著；梁俊艳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1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ISBN 978-7-5201-1628-2

I. ①中… II. ①阿… ②梁… III. ①中印边界问题
- 研究 - 1914 ~ 1950 IV. ①D8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7560 号

·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 **中印涉藏关系史 (1914 ~1950)** ——以英帝国外交史为中心

著 者 / [英]阿拉斯泰尔·兰姆

译 者 / 梁俊艳

校 者 / 张 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周志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43.75 字 数：82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1628-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2016-114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 江蓝生

主任 郝时远

副主任 晋保平

成 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旦增伦珠 尕藏加 郝时远 何宗英

胡 岩 江蓝生 晋保平 刘晖春

马加力 石 硕 宋月华 苏发祥

许德存 (索南才让) 许广智 杨 群

扎 洛 张 云 仲布·次仁多杰

周伟洲 朱 玲

总序

郝时远

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是一个自然地理、人文社会极具特色的地区。雪域高原、藏传佛教彰显了这种特色的基本格调。西藏地区平均海拔 4000 米，是人类生活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藏传佛教集中体现了西藏地域文化的历史特点，宗教典籍中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天文、数理、哲学、医学、建筑、绘画、工艺等知识体系之丰富，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知识积累，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影响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国际性的藏学研究离不开西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理所当然是藏学研究的故乡。

藏学研究的历史通常被追溯到 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对西藏地区的记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公元 7 世纪藏文的创制，并以藏文追溯世代口传的历史、翻译佛教典籍、记载社会生活的现实，就是藏学研究的开端。同一时代汉文典籍有关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及其与中原王朝互动关系的记录，就是中国藏学研究的本土基础。现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藏学，如同汉学、东方学、蒙古学等国际性的学问一样，曾深受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但是，西学对中国的研究也只能建立在中国历史资料和学术资源基础之上，因为这些历史资料、学术资源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史实，而且包括了古代记录者、撰著者所依据的资料、分析、解读和观念。因此，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发展，



不仅需要参考、借鉴和吸收西学的成就，而且必须立足本土的传统，光大中国藏学研究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门学问，藏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术研究领域，“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即是立足藏学研究综合性特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自2009年“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成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管理办法》，采取发布年度课题指南和委托的方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申报。几年来，根据年度发布的项目指南，通过专家初审、专家委员会评审的工作机制，逐年批准了一百多项课题，约占申报量的十分之一。这些项目的成果形式主要为学术专著、档案整理、文献翻译、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类型。

承担这些课题的主持人，既包括长期从事藏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包括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后生晚辈，他们的学科背景十分多样，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语言学、生态学、心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地理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等诸多学科，分布于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专家委员会在坚持以选题、论证等质量入选原则的基础上，对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藏族聚居地区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这些地区的科学研究院机构、高等院校大都具有藏学研究的实体、团队，是研究西藏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力量。

“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覆盖广的特点。在历史研究方面，以断代、区域、专题为主，其中包括一些历史档案的整理，突出了古代西藏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在宗教研究方面，以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制度及其影响、寺规戒律与寺庙管理、僧人行止和社会责任为重点，突出了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在现实研究方面，

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突出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主题。

在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之一，也是没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的中国实践，其开创性自不待言。同时，以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为主题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面对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特点、社会结构等特殊性，而且面对境外达赖集团和西方一些所谓“援藏”势力制造的“西藏问题”。因此，这一项目的实施也必然包括针对这方面的研究选题。

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图谋将西藏地区纳入其殖民统治而制造的一个历史伪案，流毒甚广。虽然在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官方承认以往对中国西藏的政策是“时代错误”，但是西方国家纵容十四世达赖喇嘛四处游说这种“时代错误”的国际环境并未改变。作为“时代错误”的核心内容，即英国殖民势力图谋独占西藏地区，伪造了一个具有“现代国家”特征的“香格里拉”神话，使旧西藏的“人间天堂”印象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且作为历史参照物来指责 1959 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诋毁新西藏日新月异的现实发展。以致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众多西方人（包括英国人）对旧西藏黑暗、愚昧、肮脏、落后、残酷的大量实地记录，在今天的西方社会舆论中变成讳莫如深的话题，进而造成广泛的“集体失忆”现象。

这种外部环境，始终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集团势力炒作“西藏问题”和分裂中国的动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随着苏联国家裂变的进程，达赖集团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展开了持续不断、无孔不入的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以其政教合一的身份，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非暴力”的“和平使者”，另一方面则挑起中国西藏等地区的社会骚乱、街头暴力等分裂活动。2008 年，达赖集团针对中国举办奥运会而组织的大规模破坏活动，在境外形成了抢夺奥运火炬、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恶劣暴行，在境内



制造了打、砸、烧、杀的严重罪行，其目的就是要使所谓“西藏问题”弄假成真。而一些西方国家对此视而不见，则大都出于“乐观其成”的“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意图。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西藏自治区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西方世界不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达赖喇嘛不能接受西藏地区彻底铲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残存的历史影响。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社会舆论中，有关中国的议题不少，其中所谓“西藏问题”是重点之一。一些西方首脑和政要时不时以会见达赖喇嘛等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显示其捍卫“人权”的高尚道义。其实，当“西藏问题”成为这些国家政党竞争、舆论炒作的工具性议题后，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作茧自缚的梦魇。实践证明，只要在事实上固守“时代错误”，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只能导致搬石砸脚的后果。对中国而言，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一哲学原理没有改变，推进“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具备抵御任何外部势力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项目的实施不仅关注了国际事务中的涉藏斗争问题，而且尤其重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议题。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进程中，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的精神，落实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十二五”规划的发展要求，是课题立项的重要指向。“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战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过程。如何把西藏地区建设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地践行发展，而且需要

科学的研究的智力支持。在这方面，本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西藏跨越式发展目标评估，西藏民生改善的目标与政策，西藏基本公共服务及其管理能力，西藏特色经济发展与发展潜力，西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与国内外贸易，西藏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西藏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跨越式发展等研究方向，分解出诸多的专题性研究课题。

注重和鼓励调查研究，是实施“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基本原则。对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涉面甚广，特别是涉及农村、牧区、城镇社区的研究，都需要开展深入的实地调查，课题指南强调实证、课题设计要求具体，也成为这类课题立项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设计了回访性的调查研究项目，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的藏区调查基础上，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回访性调查，以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微观社区的变化。这些现实性的课题，广泛地关注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人口、妇女、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改善问题，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传统技艺、风俗习惯等文化传承问题，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农牧业、旅游业、城镇化等经济发展问题，自然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等生态保护问题，等等。我们期望这些陆续付梓的成果，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西藏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反映藏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实，体现科学的研究服务于实践需求的智力支持。

如前所述，藏学研究是中国学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学术事业方面的重要支点之一。“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实施涉及的学科众多，它虽然以西藏等藏族聚居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从学科视野方面进一步扩展了藏学研究的空间，也扩大了从事藏学研究的学术力量。但是，这一项目的实施及其推出的学术成果，只是当代中国藏学研究发展的一个加油站，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藏学研究综合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加强了藏学研究服务于“中国特色、西藏特点”



的发展要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无论是理论预期还是实际过程，都面对着诸多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的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来自国际层面和境外达赖集团的干扰。继续深化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进入结项和出版阶段之际，我代表“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专家委员会，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项目领导小组几年来给予的关心、支持和指导致以崇高的敬意！对“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办公室在组织实施、协调联络、监督检查、鉴定验收等方面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承担“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出版事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课题鉴定环节即介入了这项工作，为这套研究成果的出版付出了令人感佩的努力，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3年12月北京

译者导论

一 兰姆的生平及学术生涯

阿拉斯泰尔·兰姆博士（Dr. Alastair Lamb），1930年1月9日出生于中国哈尔滨。他先后在中国香港、美国和加拿大接受教育，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获得剑桥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高级奖学金（Senior Rouse Ball Scholar）。兰姆在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18世纪晚期至1904年荣赫鹏远征期间的英国与西藏关系研究》。

兰姆的父亲蓝来讷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1922年来华，1928年任驻哈尔滨代理副领事，并先后在英国驻华领事机构担任参事、公使等职，见证了这一时期中英关系的发展演变。^①父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兰姆“无数的建议与宝贵的信息，尤其是涉及英国和中国的人物”，用兰姆的话来说，“他对20世纪20年代四川盘根错节的政局的了解，对我尤为重要”。^②因此，家庭特别是父亲的因素对兰姆的学术兴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956~1989年，兰姆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历史高级讲师）、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加纳

① 蓝来讷爵士（Sir Lionel Henry Lamb, 1900~1992），英国外交官。1922年来华，为使馆翻译学生。1928年任驻哈尔滨代理副领事。1931年任使馆汉务副参赞。1934年任驻上海总领事馆二级领事。1937年任使馆代理中文秘书，旋任一等中文秘书。1945~1946年任大使馆参事，1948年以公使衔代理馆务。1952年继胡阶森为驻北京代办，1954年离华。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主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70页。

②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Roxford Books, 1989, Acknowledgements, viii.

（加纳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英国和巴基斯坦（曾为已故巴总统 Z. A. 布托当过一年多顾问，并多次长期在巴基斯坦访问、研究）担任大学历史学讲师、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工作。1992 年、2006 年再度重返巴基斯坦进行访问。

他对自己的研究兴趣概括为以下几方面内容：

- (1) 英属印度同中亚的关系，尤其对西藏感兴趣。
- (2) 对一些考古学和人类学主题感兴趣，包括伊斯兰教传入之前的马来亚半岛历史，西非、北非的古代传统纺织业及纺织技术。
- (3) 1947 年后中印边境争端的演变。
- (4) 阿富汗近现代史。
- (5) 印度与巴基斯坦间的克什米尔问题，包括克什米尔自然和历史两方面。^①

1. 兰姆在西藏历史方面的研究

兰姆最大的学术贡献莫过于对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的研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围绕着 1766～1904 年的英印与中国西藏关系史展开，并逐渐拓展、下延至民国期间。

在有关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研究领域，兰姆先后出版了《英国与中国中亚，通往拉萨之路（1767～1905）》（*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修改版本在 1986 年出版，题为《英属印度与西藏，1766～1910》，*British India and Tibet 1766 - 1910*）、《麦克马洪线：1904～1914 年间印度、中国与西藏关系史研究》（2 卷本，伦敦，1966，《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 2 vols, London, 1966》^②）、《中印涉藏关系史（1914～1950）》（赫廷福特伯利，1989，《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Hertfordshire, 1989）^③ 及《1774～1777 年波格尔、汉密尔顿不丹与西藏之旅》（赫廷福特伯利，2002，《Bhutan and Tibet. Travels of Bogle and

^① 以上有关兰姆先生的学术生涯及其著作，均由兰姆先生亲自为译者提供，在此表示深深的感激。

^② 中文版名为《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后同。

^③ 即本书。



Hamilton 1774 – 1777, Hertfordshire, 2002) 等学术著作。

兰姆对清代中期至民国期间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深入研究，他利用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等原始档案资料，耐心细致地梳理了这段历史，并提出鞭辟入里的见解，成为这一时期英国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著作也成为该领域不可多得的权威专著。

2. 兰姆在中印边界方面的研究

兰姆在中印边界争端研究领域亦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依据史料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印边界争端，这在西方学术界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60~7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一系列论著：《印藏边境》(*The Indo-Tibetan B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6, May 1960)、《中印边境：边界争端的根源》(*The China-India Border: 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麦克马洪线》(2卷本)(*The McMahon Line*,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英印帝国边界研究》(*Studying the Frontiers of the British Indian Empire*, 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53, Oct. 1966)、《喜马拉雅山战争》(*War in the Himalayas*, Modern Asian Studies, 5 [1971], MacMillan)、《中印在拉达克的边界》(*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75)等。

3. 其他研究领域

除中印边界争端外，兰姆对于印巴克什米尔危机也格外关注。他在1966年著《1947~1966年间的克什米尔危机》(*Crisis in Kashmir 1947 – 66*, London, 1966)、《亚洲边界问题研究：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Asian Frontiers. Studies in a continuing problem*, London, 1968)、《一份充满争议的遗产：克什米尔》(*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 Hertfordshire & Karachi, 1991)、《不完整的分割：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1947~1948年》，(*In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 – 1948*, Hertfordshire & Karachi, 1997)等一系列著作均对克什米尔问题的起源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和研究，令他亦成为一位克什米尔问题专家。

正如他本人所言，他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也有着浓厚兴趣。他所著《在吉打州中部的巴株巴辖古迹的挖掘与重建

报告》（吉隆坡，1960，同时在新加坡出版，书名为《巴株巴辖古地武吉》，*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andi Bukit Batu Pahat, Central Kedah, Kuala Lumpur 1960* [also published in Singapore, 1960, as *Chandi Bukit Batu Pahat*]), 《马来北部地区和泰国南部地区的早期印度教徒与佛教徒定居点论文集》（吉隆坡，1961，*Miscellaneous Papers on Early Hindu and Buddhist Settlement in Northern Malay and Southern Thailand*, Kuala Lumpur, 1961），《从满清藩属到古老的顺化：自17世纪至法国征服前夕的英国—越南外交史》（伦敦，1973，*The Mandarin Road to Old Hue. Narratives of Anglo-Vietnamese diplomacy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eve of the French conquest*, London, 1973）。他甚至对非洲的纺织业感兴趣。他与夫人威尼斯·兰姆合著的《喀麦隆的传统纺织业》（*Au Cameroun-Weaving Tissage*, 英格兰赫特福德郡, 1981）和《塞拉利昂的纺织业》（*Sierra Leone Weaving*, 英格兰赫特福德郡, 1984）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二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由致谢、十四章正文、参考书目和索引四部分组成，下面简要介绍十四章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引言：1914年情势分析，回顾了1914年前的西藏历史及英国与西藏的关系史，并分析了1914年的形势，重点涉及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的相关内容。兰姆客观地指出西姆拉条约是无效的，他引用英属印度政府致贝尔的信函来表明英国对此问题的看法：“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俄国政府也不承认西姆拉条约，因此，从目前来看，该条约是无效的。”^①此外，对于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和夏扎私下互换的公文，兰姆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914年3月24日和25日交换的公文是否具有任何条约具备的法律效力？很可能没有。”^②

^①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Roxford Books, 1989, p. 20.

^②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Roxford Books, 1989, p. 14.



第二章从麦克马洪到台克满，1914～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以1914～1917年的西藏历史为主线，围绕英国同西藏、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作者对朱尔典、卡罗、贝尔、顾维钧、尹昌衡、张毅等人的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并涉及日本、俄国在英藏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章台克满，昌都和绒坝岔，1917～1919年，则以台克满在藏活动和《昌都协议》、《绒坝岔协议》的签订为中心，围绕路易斯·金、刘赞廷、陈遐龄、彭日升等重要人物的活动对这段西藏历史展开论述。涉及打箭炉及传教士在打箭炉的活动、康藏矛盾的渊源等，在对台克满在藏行动的描述中也揭露了英国政府的企图。兰姆通过分析台克满的纪行以及其他档案资料，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西藏人和中国人都没有要求台克满在这个时候大老远来到战场并帮助双方调停……调停的初衷仅仅是台克满的一厢情愿”^①，“台克满十分担心陈遐龄或其他任何中国官员先发制人，在没有英国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达成某项中藏协议”。^②英国的居心不言自明。

第四章东部西藏与英中谈判，1919～1920年，围绕朱尔典、台克满、路易斯·金、施肇基、唐绍仪、陈箓、石青阳等人物之间的折冲樽俎，对英中谈判做了详细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兰姆对以往未受重视的路易斯·金给予较高评价，他指出：“路易斯·金洞悉中国官员的心态，这在其《动荡的中国》一书中通过对其性格的描述可知，尤其对这一时期深层的历史而言，这本书信息量很大，比台克满所著《一位领事官员在东部西藏的旅行》更具有可读性。”^③同时，兰姆也对金抱有很深的同情和惋惜：“路易斯·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但在官僚体制中如何生存以及向上钻营的这场大角逐中，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相比（既包括在中国领事馆，也包括在印度文职机构的同僚），他宛如一个初出

^①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Roxford Books, 1989, p. 60.

^②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Roxford Books, 1989, pp. 60–61.

^③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Roxford Books, 1989, p. 102.



茅庐、不谙世事的孩子。”^①

第五章甘肃及贝尔使团出访拉萨、为西藏提供武器，1919～1922年，对于甘肃使团和贝尔使团出使拉萨、英国为西藏大量提供武器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关于西藏的地位，兰姆认为：“允许西藏加入主权国家之列真的是个好主意吗？谁知道西藏政府会作出怎样具有危害性的举动？更理想的状态是，英属印度政府当然希望西藏的真正地位处于模糊状态。与此同时，英属印度政府还能直接同拉萨政府打交道，以便在边疆政策方面获取最符合自身的利益。”^② 可谓道出了当时英属印度政府对西藏政策的真实想法。

第六章政务官贝利在锡金，1921～1928年，则重点论述了1921～1928年的西藏历史，以及政务官贝利在藏的活动。兰姆在本章对西藏的神权政治、政教合一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并论及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之间的矛盾渊源及其走向与影响。兰姆认为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之间的矛盾为英国提供了所谓“调停”机会：“如果仅仅因为不可避免地邀请锡金政务官前来调停两位化身的矛盾，那么班禅喇嘛逃离西藏恰好为英国使团再次赴拉萨制造了一个机会。”^③

第七章威尔使团与东部西藏危机，1928～1933年，则围绕刘曼卿使藏、威尔使团使藏展开，并详细考察了1928～1933年大金寺和白利寺之间的争端与矛盾。兰姆在谈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东部西藏的统治时说道：“那些在东部西藏亲身体会过达赖统治的人发现，与任何中国人的统治相比，达赖的统治和压迫才是最沉重的。”^④ 他还探究了东部西藏危机的原因，《甘孜停战协议》的形成。他对以往史书着墨不多的格桑泽仁多所关注，还对英国积极介入东部西藏危机并为藏方提供军火等事实详加论述。

^①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Roxford Books, 1989, p. 102.

^②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Roxford Books, 1989, p. 110.

^③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Roxford Books, 1989, p. 152.

^④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Roxford Books, 1989, p. 193.



第八章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喇嘛之死及中国重返拉萨，1933～1937年，重点分析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及其对西藏政局的影响，威廉逊使团两次出使西藏试图“调停”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之间的矛盾，黄慕松使团来藏致祭，九世班禅返藏的努力及最终于1937年圆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第九章古德使团第一次使藏与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发现，1936～1945年，围绕古德使团第一次来藏及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发现，对1936～1945年的西藏历史进行了叙述分析。

第十章战争，1940～1945年，则围绕着二战期间西藏独具的重要作用展开，对于英国、美国等国在中国西藏的政策予以重点考察，认为由于强大的美国逐渐介入西藏事务，英国对藏政策受到一定的影响。

第十一章边界问题，1914～1947年，从拉达克到锡金；第十二章边界问题：麦克马洪线和阿萨姆喜马拉雅，1914～1936年；第十三章边界问题：东北边境特区的设立起源，1936～1945年，则围绕拉达克、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及阿萨姆喜马拉雅等英藏边界问题，以及英国设立的东北边境特区展开，对于了解当今的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渊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十四章英属印度帝国的最后岁月，1945～1947年，旧西藏的终结，论述了英国政府统治印度最后阶段的对藏政策，作者重点探讨西藏“外交局”为了挽回颓势积极采取的“外交”行动以及英国政府对此的态度：“英国政府认为，他们已不必再对西藏问题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们早已中断了和西藏的任何直接的地域性联系。英国的火炬现在已传递给印度政府。既然印度政府已明确表态，他们不准备为西藏提供任何直接军事援助，而那些剩余的布朗式轻机枪和迫击炮根本不够西藏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西藏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因此，英国政府下定决心，绝不能给西藏人发放西藏护照，致使棘手的香港问题与注定失败的西藏问题纠缠在一起。”^①

^①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Roxford Books, 1989, p. 521.